

西方光影里的印度残像

□马 良

在西方的语境中寻找印度,一路跋涉,很可能还是回到陈旧的后殖民话语,疲惫又欲罢不能。

印度之于我们,是一个矛盾的存在。关于印度,我们又知道些什么?比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好不到哪里。光是一部英国人拍的、按好莱坞口味改编得面目全非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就提供了一大堆新鲜的观感。然而,印度又是整个东方殖民史的缩影。看印度,透过西方人的镜头去看印度,恍若临水自照,《名利场》里铺张的东方元素,《印度之行》里对英国人一度奴颜婢膝的阿齐兹医生,都熟悉到刺目。

《名利场》:女性主义的宝莱坞风情秀

“名利场”原是小说真正的主角,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各色人等,不过为它提供注解。而抽离了这层内涵的浮华景象,在电影里成了贫穷而野心勃勃的贝姬一个人的景象。一个半世纪过去了,日不落帝国已被雨打风吹去,资本在西方社会也已经安全度过了血淋淋的分娩,辛辣的讽刺与批判已经没有了市场,电影将贝姬重新包装,她成了现代女性主义的先驱,早生了150年的“律政俏佳人”。当然,奈尔在好莱坞类型片的框架内也夹带了一点私货——东方人对乱世飘零的含蓄喟叹。

《印度之行》:对殖民统治的反思之作

马拉巴山洞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件事将永远不会搞清楚”。借小说人物之口,E.M.福斯特将《印度之行》(1924年)的谜面永远地悬在空中。小说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初,英国女子阿黛拉小姐和未来婆婆穆尔夫人同赴印度,看望未婚夫——在当地任殖民官的朗尼。印度的穆斯林医生阿齐兹热切地招待她们,几乎将自己放在了仆役的位置上,陪同她们到马拉巴山洞一游。不料两位女士倍感不适,阿黛拉更是伤痕累累地哭喊着跑出山洞。一场控告阿齐兹意图非礼的官司掀起轩然大波。

一个主体精神强大的作者,在创造的时候,无法容忍另一个同样强大的作者。这可能是为什么一流的小说不会产出一流电影版本的原因。《印度之行》几乎是少数的例外。大卫·里恩的最后一部电影宿命般遭遇福斯特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说。他用自己的方式解谜,虽然没有用言语明说,但里恩已经用影像呈现的方式坦然告诉观众:男主角是无辜的,是殖民者的傲慢和偏见将他送上法庭。比起原著来,电影对殖民者鞭笞得更重。殖民统治的原罪,在二十世纪初大英帝国的余晖中还在讨论,到了电影拍摄的1984年,却已经成为一种常识。

阿黛拉在山洞中,显露出在荒野遇到欢喜佛像和猴群时相似的迷狂,种种细节暗示她在脆弱的状态和极具压迫感的自然环境下,陷入了性幻想。从D.W.格里菲斯《娇花溅血》(1919年)里虚弱的大烟鬼程环,到周润发、李连杰在好莱坞塑造的一系列没人爱的反面角色,东方题材的电影里白种女人和东方男人相遇,后者欲求前者而不得,始终是一种顽固的定势。一个英国上流社会的淑女对一个印度小个子男人陷入了某种迷狂,仅仅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暗示,福斯特已经远远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甘地传》:从人性抵达神性

“后世的子孙也许很难相信,世上竟然真的活生生出现过这样的人”(爱因斯坦语)。“世纪伟人。值得一生珍视的电影”。一位美国影评人写道。电影以史诗的笔触大开大合地书写了甘地的一生。甘地年轻时取得英国律师资格,被派往南非工作,因为不肯从一等车厢换到三等车厢被人从火车上扔下。他铭记种族歧视的耻辱,毕生投身对殖民者“非暴力、不合作”的斗争运动,几度绝食,几度入狱,直至献出生命。

殖民者总是宣称他们为这里带来了“文明”与“进步”,而甘地的斗争策略,就是用自我牺牲,来突显和反衬殖民统治者的残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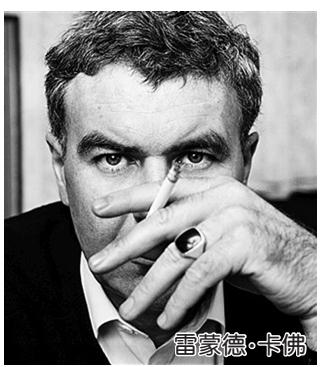
殉道式的牺牲,真的可以平息残暴和杀戮吗?电影描绘的历史说,可以。为了制止印巴分离时的宗教仇杀,甘地在加尔各答绝食,少数宗教极端分子认为他在帮助对方,对他发出死亡威胁。然而,当地的反对者们知道他已经气若游丝,纷纷到他的居所表示悔悟,甘地创造的历史有如神迹,而他抵达神性的通天梯,是西方现代话语中的“人性”(humanity)。

殖民者用铁蹄蹂躏了一块土地,而甘地用“和平”反对他们。他想证明那套殖民者挂在嘴上的价值观,自己付诸实践,而且做得更好。这是殖民者话语的胜利还是失败?三言两语真的很难说清。

甘地在有生之年,没有将印度引向和平安乐,却在过世后在西方语境中大获全胜,成为神圣的存在。写到这里,我不知怎地想起了《第二次握手》的经典情节,美丽的华裔女科学家丁洁琼忐忑地站上了西方讲坛,用自己的研究成果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第三世界人民的愿望都是相似的。

还原真实的雷蒙德·卡佛

□王 薇 李 夏



雷蒙德·卡佛是时下文学界热衷谈论的作家。“美国新小说的领军人物”、“美国的契诃夫”、“极简主义大师”,闪光的称号促使越来越多的人们关注卡佛和他的短篇小说。2009年,美国文库出版了卡佛的短篇小说集,同年,卡佛传记《一个作家的一生》的出版使得原本在美国销声匿迹许久的卡佛再次复燃。同样近两年间,中国读者也在兴致盎然地读卡佛。

不少读者失望地发现,在卡佛的笔下,生活平淡到了极致,但仔细品味,却能在平淡背后发觉生活的本真。卡佛运用其特有的叙事技巧层层剖析生活现实,在不经意间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和抚慰。有评论家称,浮躁的心灵无法与卡佛的作品相契合。当人们静心沉醉在卡佛的文字里,会在看似平铺直叙的句子中悟出蕴涵的生命寓意。

主题的琐碎、文字的简洁、修饰描述的省略、甚至是故事情节的留白,使卡佛得到了“极简主义之父”的称号。卡佛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市美国七八十年代中下层小市民。诚如作品合集《请别装腔作势》的题目所示,卡佛拒绝塑造传统美国文学中高大的英雄形象,而是醉心于记录同自己有相似命运的人们。卡佛一生穷困潦倒,巨大的生活压力几乎使他放弃了对文学的追求。相对于写作的意愿,他更清楚那些无法逃避的现实生活责任,一如小说《距离》中年轻夫妻的故事,虽已为人父母,卡佛依然称他们“男孩”和“女孩”,他们拥有青春,可生活的艰辛过早地压在了这对年轻人的肩头,他们不得不承受难以逃脱的现实的冰冷。卡佛的小说里充满了生活的艰辛与苦难,让人们容易在读他作品时产生绝望的情绪。而正是这种令人不寒而栗的真实,饱含着作家的人生感悟和智慧。

长久以来,人们好用“肮脏现实主义”来论及卡佛作品的主题与内容,批评家们指出,卡佛的小说过于渲染美国社会底层人民的悲苦生活。但其实卡佛很少在生活的悲苦或物质的缺乏上墨墨。他的故事背景模糊,更缺乏对具体细节的描述,我们能读到的是“我有一份工作,帕蒂却没有”(《维他命》)、“我丢了工作”(《收藏家》)这样对背景简单到极致的叙述。更确切地说,卡佛真正关注的是现代人精神困顿的存在状态,它存在于个体经验之中,处于现实断裂、易变的边缘。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曾说:“在社会现实的外衣下隐藏着另外一个现实,那是一种潜在的存在,它是一种尚未进入大众意识的真现实,作家的使命之一便是对这种现实进行勘探与发现。”当我们阅读卡佛时,我们似乎在其笔下真实冰冷的现实中隐隐发现了这种“潜在的存在”。卡佛通过对其笔下芸芸众生的认识,反省与追问直接关注人类自身存在的问题,这使其作品具有了村上春树所推崇的那种具有“某种穿透性”的特质。卡佛以他非凡的文字激发着我们的想象,通过个体对存在本身独特的思考去关注那些为社会主体现实所忽略了的存在。

提及卡佛,人们常常会把他与“极简主义”联系在一起。近年来,学者们发现,这类作品不仅是卡佛自己的创作,他的编辑利什在卡佛简约风格的形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将1981年问世的卡佛的代表作《当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谈论什么》与2009年首次收录在《美国文库》卡佛选集中的原稿《新手》加以比较,我们便可清楚地看到利什对卡佛的故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据统计,利什正式出版《当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谈论什么》时,将原稿《新手》的内容删减了58%,其中一篇题为《咖啡先生和修理先生》的小说原稿甚至被删减了78%。如果说卡佛的作品原本就有简约的成分,那么经过编辑删减后的卡佛小说才真正具有了“极简主义”的风格。不可否认,正是在利什的帮助下,卡佛才赢得今天的名望。历史不能改写,但人们乐于虚构历史:倘若没有利什,卡佛是否依然能够博得众人的青睐?所幸的是,卡佛后期的作品基本呈现出他原本的风格——绝望之中尚存一丝暖意。

卡佛对故事自由的拆解与重组,使读者不能只是被动地聆听,而需要主动地参与思考,随时注意卡佛抛出的一个个出乎意料的细节。在很多作品中,卡佛将看似毫无意义的生活细节编织在文字里,读者根本理不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倘若要为卡佛的作品找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something”一词再合适不过。它可以理解为某件事、某个人,甚至是生命中的某个瞬间、某种领悟。

卡佛被誉为“美国的契诃夫”。契诃夫是卡佛文学创作上的偶像,他最后一部作品《差事》便是向契诃夫的致敬之作,这也是卡佛惟一一篇以真实历史人物展开的虚实兼备的作品,是卡佛在创作题材和写作方法上的新尝试。《差事》描写了契诃夫之死,去写出自己对人生、对写作的态度。小说中卡佛描写一个宾馆服务生,受契诃夫妻子之托去找殡仪师,这也许是这个小人物一生最重要的差事,但故事结尾年轻人“脑子里只有那个躺在他脚趾旁的软木塞……伸手去够那个木塞,并最终把它握在自己手里”。雷蒙德·卡佛在短暂一生中、在小说中捡起小人物命运的“木塞”,履行着作家的历史使命。

■动 态

“理解泰戈尔:新视野与新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 8月22日至25日,“理解泰戈尔:新视野与新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

今年是中印建交60周年,2011年是印度近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教育家泰戈尔诞辰150周年。本次研讨会旨在纪念泰戈尔,同时庆祝中印建交60周年,并进一步探索新的时代背景下泰戈尔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法,由此增加中印两国之间的理解和友谊。

本次研讨会由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南亚学系共同主办。印度驻华大使苏杰生和前中国驻印度大使周刚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美国哈佛大学南亚研究项目主任 Sugata Bose、著名中印学者谭中、印度泰戈尔大学校长 Karunasindhu Das 出席会议并宣读论文。来自印度、孟加拉、美国、新加坡、加拿大等多个国家的学者参加了会议。

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泰戈尔的文学作品、艺术成就、哲学思想、社会活动,就泰戈尔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当今世界的意义、泰戈尔与中国的关系及中印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对亚洲的发展、中印文化交流进行了展望。研讨会期间还举行了最新出版的中英文学术论文集《泰戈尔与中国》的新书发布会。

此次会议是纪念泰戈尔诞辰150周年系列活动的一部分。该纪念活动分为四个部分,2009年至2010年已陆续在美国、新加坡、北京举办了三次,2011年初将在加尔各答召开第四次会议。此次北京大学的研讨会对促进中国国内的泰戈尔研究以及中国学者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加深对泰戈尔思想的认识和理解,发展中印友谊都具有重要意义。

(印 文)

俄罗斯“处女作奖”作品首次引进中国

本报讯 在第十七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化圆为方——俄罗斯处女作奖小说集》举行了新书发布。

这是俄罗斯“处女作奖”作品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六位俄罗斯“处女作奖”获得者德米特里·法列耶夫、奥列加·奥诺伊卡、伊琳娜·鲍嘉特廖娃、瓦列里·佩切伊金、安娜·拉夫里年科、娜塔莉娅·克柳恰廖娃应邀在图博会上亮相。该小说集是在中国版权服务站的积极推动下,通过中华版权代理中心引进版权。

俄罗斯作家、“布克奖”获得者、“处女作奖”负责人奥莉加·斯拉夫尼科娃介绍说,奖项设立之初,俄罗斯文学联盟对“处女作奖”颇有疑虑,担心年轻的新人

优秀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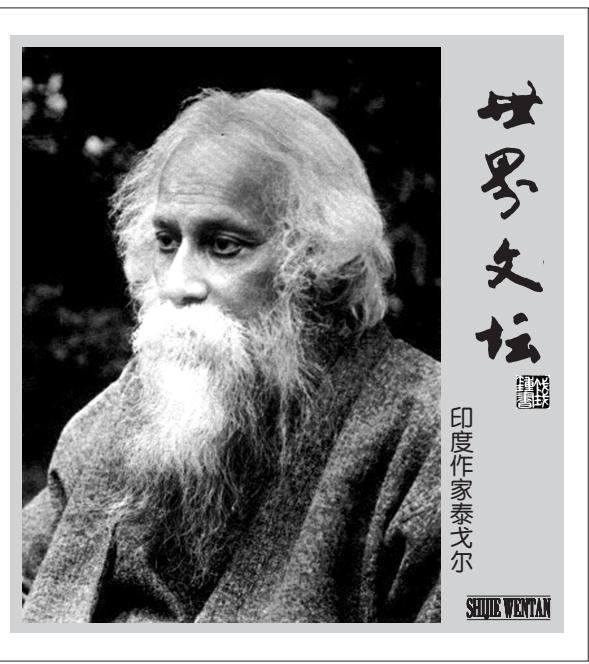
俄罗斯“处女作奖”汇集了俄罗斯最优秀的当代文学作品,是俄罗斯最具信任度和威望的奖项之一,与俄罗斯“布克奖”齐名。“处女作奖”设立于2000年,由“下一代”人文基金会发起。该奖项对年龄有着严格限制,申请者的年龄不得超过25岁。目前,俄罗斯每年申报“处女作奖”的文学作品有三万至五万部,类别分为散文、诗歌、随笔、戏剧和儿童文学,进入决赛的作者能够参加“处女作奖”周等讲座和交流活动。自今年起,俄罗斯“下一代”人文基金会发起筹备了新的国际性的“处女作奖”计划,目的是向外国读者推荐最新的俄罗斯文学和年轻作者。

俄罗斯作家、“布克奖”获得者、“处女作奖”负责人奥莉加·斯拉夫尼科娃介绍说,奖项设立之初,俄罗斯文学联盟对“处女作奖”颇有疑虑,担心年轻的新人

能否向读者讲述些什么。但事实证明,即使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也能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人生阅历。“处女作奖”的设立就是鼓励俄罗斯年轻作家完成人生中的第一部书,描述青年时代对世界独一无二的认知和感受。“处女作奖”引导了大量新鲜血液回流到俄罗斯文学当中,这种突变和转型恰是对俄罗斯文化和社会困境的有力回应。

此次来到中国的六位年轻作家代表了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俄罗斯作家,他们没有历史的负担,以全新的方式看待世界,拥有新的独特的视角;他们有写作天赋,具有创新意识和写作热情,成为俄罗斯文学界的新兴力量。出版方希望,通过《化圆为方》,使中国读者接触到与以往严肃深沉的俄罗斯文学不同的当代俄罗斯文学,感受俄罗斯青年朝气蓬勃的思想和生活。

(王 楠)



广 告

百家 之言 文学的批评 施战军

军旅作家短篇小说全国征文

背对着海 (南海舰队) 萧 潇

好兵小货 (空军司令部) 李金海

少校王保国的好人好事 (天津武警) 邱 辉

维克多大道往事(中篇小说) 白天光

泽地的恋情 鲍 十

单响 樊健军

我们能否相信坚守的力量 李云雷

楚微微(中篇小说) 李心怡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创作谈) 李心怡

虎门:大炮的悲喜剧 吕雷

追赶不到的远方 芦 楚

镜像 彭家河

每周推介 周伦佑的诗:变形蛋

灰指甲 杨方晃

巩乃斯牧羊人(外二首) 杨 晓

坐在高高的山冈上(外二首) 李 晓

房屋的心事(外二首) 白 频

名著主编:陈国凯。社长:廖红球。主编:谢望新。常务副主编:展锋。副社长:欧阳露。邮政代码:46-37。主办单位:广东省作家协会。定价:5.80元。地址:广州市天河龙口西路552号广东文学艺术中心七楼。邮政编码:510635。电话:020-38486216。传真:020-38486389。E-mail:gzzp2001@21cn.com。

二

〇

一

〇

九

〇

九

〇

九

〇

九

〇

九

〇

九

〇

九

〇

九

〇

九

文学月刊

2010年第九期

总第五百五十九期

要

要

要

要

要